

互构与变革：

中国参与国际社会 文化体系进程研究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Coevolutio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孙吉胜 等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互构与变革：中国参与 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程研究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Coevolutio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孙吉胜◎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互构与变革: 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程研究 / 孙吉胜等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12-5228-2

I. ①互… II. ①孙… III. ①文化交流—中外关系—研究—世界 IV. ①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5338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余 岚
赵 玥
陈可望
小 月

书 名

互构与变革: 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程研究

Hugou Yu biange: Zhongguo Canyu Guoji Shehui Wenhua Tixi Jingcheng Yanjiu

作 者

孙吉胜 等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680毫米 1/16 20印张

字 数

307.2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228-2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实际情况，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和受遏制的境地，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否定、怀疑和排斥。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开始融入国际体系，陆续加入各类国际组织，签署各类公约、条约。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加快，逐渐从旁观者、学习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中国同时也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中国如何看待目前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如何提升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如何变革现有的国际体系，使其向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如何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履行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使其更加公平有效，这些都成为人们广为讨论和争论的话题。

针对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国内外学界也给予了广泛关注。目前，关注较多的是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与安全、国际经济体系的研究，但很少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行系统探讨。^①正如心理学家亚

^① 有些此方面的研究多是针对中国如何参与某个具体组织的个案研究，代表研究主要有谢喆平：《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晓燕：《“主体间承认”与体系内文化安全——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吴文成：《传授与学习：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验研究》，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

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指出的，人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首先是安全，其次是经济，最后是文化与自我实现方面的内容。^① 社会文化领域的内容属于更高层级内容，与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即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人类的福祉紧密相关。冷战结束后，科技、教育、文化等软性内容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之间软实力竞争激烈。同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跨国性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很多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安全和生存，迫切需要各国协调，合作应对解决。社会文化内容广泛渗透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诸如艾滋病这样的社会问题会影响到每个个体的利益，教育领域的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则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保护意识，进一步唤醒民族文化自觉。全球化的深入也使各种思潮跨国流动，在信息化的推动下，各种思想、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扩及全球，造成了国家间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外来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的碰撞。^② 社会文化内容广泛渗透于当前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当今世界。社会文化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个维度，成为各国博弈的一个重要软性领域。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各个领域经历了中国融入当中的实践参与过程。

因此，研究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如何与之互动，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独特路径。社会文化体系与政治、经济、安全相比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过程也显示出很多独特的方面。本研究认同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体系中的行为体与体系互动是一个互构过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那么，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与参与其他国际体系有哪些不同？可以为参与其他体系提供哪些借鉴？中国的参与实践对中国以及体系本身产生了哪些影响？该研

^① David M.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Number 16, 2013, p.67.

^② 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4期，第60页。

究旨在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探讨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独特方式与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中国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产生的影响。该研究可以为中国提高在世界上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更好地参与全球社会文化治理提供启示。而中国在整个参与过程中体现出的灵活性也可促使我们对中国如何参与其他领域的实践,如何解决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难题、如何看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行更多思考。

研究国际社会文化体系首先应该从对社会文化的界定开始。社会文化体系应该包含“社会”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在这里主要是指社会问题。按照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问题主要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① 社会问题与社会本身一样,呈现过程性和动态性特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为违背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就会影响正常的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就会成为社会问题。于是,人们发明某种制度来对社会问题进行防范和控制。^② 社会问题可以是社会发展到特定的阶段出现的客观因素,它们可以严重到威胁社会安全,如某种疾病。社会问题也可以是由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而引发的主观性内容,如人权问题。当社会上多数人意识到其危害时,会组织起来努力解决。一般来说,社会问题会阻碍社会共同生活的顺利进行,会阻碍社会的正常进步。成为社会问题一般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即超出个人特殊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有关的,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利益或生存条件的公共问题。^③ 社会问题可以大致分为政治性社会问题、经济性社会问题、文化性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可以具体表现为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劳工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社会问题也可以大致分为结构性社会问题、跨时空性社会问题、伴生性社会问题、失范性社会问题和过

① 《社会问题》,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632.htm>, 登录时间: 2013年1月25日。

② 庞树奇、范明林主编:《普通社会学理论》,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355页。

③ 《社会问题》,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632.htm>, 登录时间: 2013年1月25日。

程性社会问题。^① 社会问题在各时代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例如，在18世纪，艾滋病这一词在人类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它不仅成为一个严峻的医学问题，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也是近年来才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当代其他一些最突出的社会问题还包括人口问题、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老龄问题等。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迁和社会转型，主要社会问题可以大致分为结构性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如农民工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越轨性社会问题，如信用缺失、青少年犯罪；病态性社会问题，如艾滋病、吸毒问题；心理性社会问题，如社会焦虑现象、精神病患者增多等。^②

社会文化中的“文化”也是一个内涵非常广的概念。就文化的定义而言，学者众说纷纭，但内涵大致相同。文化的概念同时也非常多元，纷繁复杂、无所不包，不同的定义只是侧重不同。文化在很多学科都涉及，如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据统计，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已经有400多种。^③ 例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④ 之后，学者们又把文化中所涉及的“实物”内容补充到了文化的概念中，如奥格本(W. F. Ogburn)、亨根斯(F. H. Hankins)以及维莱(M. M. Willey)等，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的能力和习惯。”^⑤ 总体

① 具体分类，详见庞树奇、范明林主编：《普通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371页。

② 肖文涛：《社会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选择》，载《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8—20页。

③ 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关于文化概念的梳理可参见孙吉胜：《文化领域的大国关系》，载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1页。

④ 朱马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博弈》，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页。

⑤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北京：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24页，转引自张骥、刘中民等：《文化与国际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而言，文化的定义可归为三类：广义上，文化作为与自然相对的概念指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义上，文化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取向、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狭义上，文化是指基本信念和意识形态。^① 本书中的文化主要采纳中义的文化定义，具体为观念取向、行为模式、社会管理方式、相关法律法规等。它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普遍认可的价值规范，最后内化为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上升至文化稳定一面的最高表现，即制度性文化。^② 它一经诞生和逐渐完善，就会形成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力量而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并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③ 它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也是区分人类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尺。例如，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各国都应该重视文物保护，因此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随着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相关的文物保护规范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并逐渐内化为文化的一个稳定内容。本研究关于文化的界定更偏向于制度性文化。

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界定的基础上界定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本书的研究主体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主要涵盖文化的中义概念的内容以及关乎整个世界的进步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性问题，如妇女、疾病、老龄化、移民等。它们不但关乎个体的国家，而且具有国际影响，涉及多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活动、事件、制度或是政策辩论。^④ 具体而言，联合国作为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的全球性机构已经成为能最好体现国际社会理念的国际机构，在提高全球意识、构建全球共识、设立标准、立法、促进人类发展等方面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对于国际社会文化体

① 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第13页。

② 文化即包含活泼、自由的一面，如人类的一切智慧、情感、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能容纳，另一方面是其极稳定的一面，即在悠久的岁月里起作用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性、国民性，给人以永恒的感觉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在它的熏陶下形成的。参见庞树奇、范明林主编：《普通社会学理论》，第306页。

③ 庞树奇、范明林主编：《普通社会学理论》，第324页。

④ 该定义受温蒂·弗莱曼（Wendy Frieman）在其《国际科学技术与中国对外政策》中关于国际科技体系的定义的启发，详见Wendy Friem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59.

系而言，联合国是一个核心要素。我们认为，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的关于社会文化的各类组织、机构和在其框架下所制定的各类公约、条约、规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一起构成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主要内容，它们在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立体、交叉运作，构成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活动，其结果一方面实现国际社会文化领域的国际治理，另一方面也促进各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与国际政治、安全、经济体系并列，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方面。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与国际政治、安全、经济体系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自身的运行特征。相比之下，它涉及内容广，运作灵活，影响广泛，这些特征也对国家参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具体实践产生了不同影响。

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很少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社会文化，即很少把国际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相对比较零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是沿着以下几个研究路径。第一种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例如，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把文化视为是社会共有知识，即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的社会意义，进而指出在不同时期，国际体系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如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①还有学者从国家战略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如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研究。也有学者从文化、文明的角度进行研究，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即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②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家安全的文化》则从文化的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研究。^③英国学派的诸多研究也涉及了文化。此类研究多是关于在国际

①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② 详见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彼得·卡赞斯坦著，宋伟译：《国家安全的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

社会的框架下对文化、文明的研究，如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形成国际社会的文化基础等。文化与文明被具体化为规范、规则和制度。卡赞斯坦在一些研究中还提出了关于多元多维文明下多种现代性协调共存的问题。^①而对国际社会问题的研究，更是零散。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专注某个社会问题，主要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切入，而非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比较多的领域主要包括人权、气候变化、毒品、贫困问题等。^②

研究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实践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实际上，从二战结束至今，国际关系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趋势是昔日军事力量至上，随后是贸易、国际金融和经济竞争力，而时至今日，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权力从国家向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网络等方向流散。^③进入21世纪后，很多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协调解决。社会文化领域已经与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同等重要，甚至影响面更广，渗透力更强。因此，研究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可以加深我们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理论研究，进而为外交实践提供指导。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其参与国家社会文化体系的实践方式不同，参与程度也不同。由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高级政治存在差别，各国对于社会文化体系而言，其选择空间相对更大，灵活性更强。不同的参与实践方式对国家本身以及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经历了消极参与、学习内化和创新塑造的过程。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体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深入，中国也逐渐意识到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大提出“经济、政治、文

① 魏玲：《后本质主义文明与国际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11期，第35页。

② 关于全球治理的作品评述，可参加Michael Marien, "Taming Global Governance Idea Chaos," CADMUS, <http://cadmusjournal.org/review/book/taming-global-governance-idea-chaos-%E2%80%9C9Cfrontier-frame%E2%80%9D-recent-books>, 登录时间：2013年1月29日。

③ 尉洪池、孙吉胜：《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流散》，载秦亚青主编：《当代西方国际思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47页。

化三者要共同发展，首次把文化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调文化的突出地位和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①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使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② 通过这些战略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继续提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同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整体国际形象也越来越需要文化力量的支撑，中国也开始更加自觉地建设软实力。回顾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国基本经历了消极参与、学习内化和影响塑造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本身都意义深远。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参与使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国际治理理念、中国经验与智慧、中国的改革实践与发展模式融入到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完善和改进。而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也为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如身份认知与定位的变化、国家政策甚至是国策的调整、制度领域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人权、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基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特征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进程，该研究主要从参与实践的理论角度，从实践性和过程性来研究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实践对中国本身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双向影响。整个研究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构成、特征、运行特点、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整体参与实践与过程等。在理论研究框架基础上，我们选取了四个研究案例。首先我们选取了联合国框架下的三个案例，即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人权机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三个案例进行具体研究。这三个案例在国际社会文化治理方面非

① 居黎东：《文化与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05年12期，第41页。

② 《十八大报告》(全文)，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登录时间：2015年12月8日。

常具有代表性。中国对这三个机制的参与可以明确体现出中国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进程与特征。除此之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深入，中国也在努力创新，主动倡导建立一些机制，成为一些机制的创始国家或发起国之一。通过这样的创新，中国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影响国际体系。在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内，中国也有这方面非常典型的努力。因此，该研究的第四个案例选择的是中国参与亚欧会议的实践，它可以作为中国此类参与的代表，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更加全面、完整。

本研究是一个集体研究成果，是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的子课题之一。该子课题由五人组成。孙吉胜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撰写序言和第一章，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和统稿；吴晓萍撰写第二章和整个项目协调；景晓强撰写第三章；李晓燕撰写第四章；季玲撰写第五章。

目 录

第1章 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特征、规范体系与运行.....	1
一、国际社会文化体系	1
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运行.....	8
三、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认知	15
四、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实践	27
五、中国的参与实践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及中国的双向影响	36
结 语.....	44
第2章 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46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与职能发展.....	47
二、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进程	59
三、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类型	66
四、中国的参与实践对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双向影响	105
第3章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	120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20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进程	129
三、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类型	143
四、中国的参与实践对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双向影响	174

第4章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实践	197
一、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197
二、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实践进程	205
三、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实践类型	214
四、中国的参与实践对中国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双向影响	246
第5章 中国参与亚欧会议机制的实践	255
一、作为国际机制的亚欧会议	256
二、中国参与亚欧会议的实践进程	266
三、中国参与亚欧会议的实践类型	277
四、中国的参与实践对中国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双向影响	291

第1章

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特征、 规范体系与运行

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体系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同时，由于其本身的特征，如内容多样性、运作灵活性和影响广泛性等，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所包含的规范也有其本身的运行特征。

一、国际社会文化体系

就国际体系而言，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与国际政治、安全、经济体系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运作方式。

（一）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构成

该研究主要把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界定在联合国框架下。具体而言，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类涉及社会文化领域的组织，如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等构成了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各类组织所制定、颁布的公约、条约等不仅在治理着各相关领域，也在建立和传播着这些领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些规范和行为准则与国家之间形成互动，

相互建构，相互改变，构成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的机构设置构成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运行的框架基础。从机构设置方面看，由于社会文化类问题不像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问题那样界限分明，管理或是治理机构相对单一，社会文化类问题在不同的机构和部门中都有所体现，经常会有交叉。例如，作为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所包含的很多机构都与社会文化有关，如其职司委员会中的麻醉药品委员会、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以个人身份组成的专家机构委员会中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类似的机构还包括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等。联合国的很多专门机构更是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联合国规定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负责协调联合国与专门机构的关系。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主要是由各国政府签订的创建文件而成立，并在国家间就某一特定的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或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工作。目前，联合国的主要专门机构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旅游组织。^② 联合国很多有关经济、社会、文教和科技方面的工作，都是在上述各专门机构的管理和协调下进行。在各机构中，有些是在联合国成立以前早已存在的，有些则是联合国成立以后才建立的。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成员国 100 个以上。在 15 个专门机构中，有 9 个专门机构与社会文化体系有密切联系，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旅游组织。这些专门机构围绕各

^① 只有在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卫生等领域具有广泛活动职能的国际组织才能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② 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uninbrief/institutions.shtml>，登录时间：2012年8月29日。

自的问题领域，进行具体领域的工作。例如，世界旅游组织主要涉及旅游目的国管理的协调、旅游业的道德与社会管理、信息与交流、信息与档案、机构与合作关系、知识网络、市场趋势、风险与危机管理、法规会议、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丝绸之路和技术合作。^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把重点放在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和信息等方面，主要专项活动涉及非洲优先、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教育、预测与展望、艾滋病毒与艾滋病、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术、最不发达国家、冲突后及冲突后应对、科学教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青年等。

联合国的各类基金和方案使各个社会文化问题领域能够纵横运作。目前，联合国共有各类基金和方案13个，主要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联合国志愿人员、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这些基金和方案所针对的问题大都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不同，这些基金和方案会在一个大的范畴之下涉及很多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儿童生存与发展、基础教育与两性平等、艾滋病与儿童、儿童保护等。^②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实际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所针对的领域有共同之处。再比如，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重点是生育健康、人口与发展、两性平等、人权、青年、母亲安全、文化敏感性、艾滋病等。^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重点则为民主治理、减少贫穷、危机预防与恢复、环境与能源、艾滋病毒/艾滋病。^④ 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些交叉。

① 关于世界旅游组织主要议题，详见世界旅游组织网站，<http://www2.unwto.org/content/what-we-do-1>，登录时间：2015年12月8日。

② 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http://www.unicef.org/chinese/>，登录时间：2012年11月5日。

③ 参见联合国人口基金网站，<http://www.unfpa.org/public/>，登录时间：2012年11月5日。

④ 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http://www.un.org/zh/aboutun/structure/undp/>，登录时间：2012年11月5日。